

精神分析与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

Psychoanalysis and Habermas' Critical Hermeneutic

王睿欣*
(WANG Rui Xin)

摘要

哈贝马斯将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与解释学结合在一起, 通过把精神分析的深层解释学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建立了自己的批判解释学, 从而为批判理论特别是交往理论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石。因此, 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揭示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的形成, 展示精神分析对哈贝马斯方法论建构的作用和意义, 对洞察和把握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及其发展逻辑则显得极为有意义。

关键词: 精神分析 自我反思 解释学 批判解释学

Abstract

Habermas combines self-reflection of psychoanalysis and hermeneutic, and establishes own critical hermeneutic through making deep hermeneutic of psychoanalysis into a ideological criticism, then founds the methodology for critical theory, especially communication theory. So, it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apperceiving and grasping Habermas' critical hermeneutic to use the view of psychoanalysis opening the forming of his critical hermeneutic, and revealing the effect and meaning of psychoanalysis toward his methodology.

Key Words: psychoanalysis, self-reflection, hermeneutic, critical hermeneutic

* 王睿欣博士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教育系讲师。电邮地址: ruixin.wang@newera.edu.my

一、前言

批判解释学（critical hermeneutics）作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的基本理论之一，将哲学解释学的批判性与经验科学的实证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批判与反思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超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上的局限性，为社会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奠定了可靠的方法论（methodology）基础。而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及其所具有的批判反思性（critical reflection）是在对精神分析作为深层解释学（deep hermeneutics）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的理解和整合中产生的。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述哈贝马斯构建批判解释学的过程，展示精神分析对哈贝马斯方法论建构的作用和意义，将使我们批判解释学的内涵和形成路径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析 and 理解。

二、哈贝马斯以方法论为视角对解释学的反思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哈贝马斯试图打破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对立，通过对它们的批判重建，树立一种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批判”的方法，这种批判的方法“既不追求科学性，也不追求玄学性，而是要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开辟一块新大地”（曹卫东，2002：4）。其中，批判的趋向是极其鲜明的，就是为了超越经验与先验约束的中介。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Karl Marx-1818）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批判方法的一个最杰出的范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以成熟形态出现的具有“反思特色”的社会理论，通过自身的实践概念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开辟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因此，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的理论既有别于自然科学，又有别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不关心其自身的起源，社会科学则自觉到自身的起源；自然科学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它研究的领域，社会科学赋予自身以本体论意义，对对象的研究带有主观的色彩。换言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能展开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社会科学的批判，关键在于他把社会的实践（practice）作为人的活动的基础和主题，把实践作为一切批判的出发点，从而使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和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种集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于一体的批判方法。但是，哈贝马斯认为虽然马克思将实践引入方法论，使其社会理论有了巨大的批判性，但是马克思把“实践”归结为工具性的“劳动”并加以分析，把物质生产的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从而把社会的互动关系即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排斥到了人类实践的领域之外。因此，马克思的方法论有向实证主义退化的倾向，这说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需要重建。于是哈贝马斯将视野转向了解释学（hermeneutics），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和理解无疑能够弥补马克思在方法论的缺失。

哈贝马斯主张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相互作用和相互理解以获得意见一致的关系，而不是劳动中的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人类的互动和交往作为人的实践的重要方面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交往是诸主体共同参与的事业，所以其中介也自然是为主体之间共享的语言。但是，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不是独白式的形式语言，而是对话式的日常语言，因为日常语言具有使个体通过在对话关系中的普遍范畴得以理解的结构，从而使主体在交往中既能通过相互认同、相互了解和相互承认而在某些普遍的方面取得一致，又能够在相互之间保持距离，维护其自我的同一性。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所研究的正是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而人类的相互理解则以解释学循环的方式运行着：个体经验实际上是种前理解，在理解和释义过程中起着一种使个体得以理解并整合诸个体的解释框架作用，而这一解释框架又是暂时的和可变的，终将随着个体的被理解做出调整（陆炜，1994：42）。在哈贝马斯看来，通过解释学的循环，我们可以在纵向上克服历史的间距，在横向上调节地理和文化上的语言间距。显然，哈贝马斯对解释学循环的认同意味着他对解释学理论的接受。对他而言，解释者属于传统并且参与传统，其前理解便是在传统的语境中构成的，解释者不可能抽象地超越他自己生命活动的开放视界，作为具体的历史存在，他同解释对象的关系并不是观察主体和其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参与的关系，因此，自然科学要消除的偶然性因素——经验，在这里成了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本质条件。

但是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等人的传统解释学却以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为模型，为了避免释义的主体性损害知识的客观性，将解释者置入原文作者的视野之中以复活原作者的意义创作，排了解释者自身的经验和特性，完全使解释学陷入了客观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哈贝马斯，1999：170）。在批判传统解释学方法的过程中，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的哲学解释学对哈贝马斯起了重要作用。伽达默尔认为，人类在自然科学活动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哲学经验、艺术经验以及历史经验等属于社会科学的活动范畴，因此，自然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必须超越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作用范围去寻求对真理的经验。他指出，理解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和首要范畴，社会科学的理解本身是一种语言现象，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还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解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实现。在他看来，解释学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而是重新把握人的存在的哲学，解释学应在传统的视野中通过对传统的理解和运用重新拥有传统，并在传统中寻回人生价值的真谛（伽达默尔，1992）。伽达默尔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局限性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理解的本质与特征的论述，在方法论上给哈贝马斯以很大启发。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的理解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他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并不满意，认为伽达默尔在方法上错误地将解释学的经验同科学方法论的认识相对立，即把关于社会科学中的真实性、真理性与自然科学的经验分析方法相对立；“把理解本体论化、把理解的过程看成是导源于人的‘此在’的原始理解或导源于主体的原

初假设与预期的一种‘本体论的自我理解过程’”（欧力同，1997：159）。主体对传统的占有也就成了主体的臆想和玄思。因此，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又完全陷入了主观主义的窠臼。

在重建马克思在方法论的过程中哈贝马斯遭遇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面夹击引发了他对解释学的反思。哈贝马斯并不否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严格区别，但是他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的维护社会体制的功能，向解释学提出一种新的客观需要，就是“把技术上可用的知识和生活世界实际知识合理地联系起来”（哈贝马斯，1986：22）。通过对自然语言范围内理解活动的反思所浮现出来的解释学的意识，“把重要科学信息翻译成社会生活世界的语言”（哈贝马斯，1986：22）。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开辟道路。因此，解释学肩负着经验分析和语言分析的双重使命，要在语法关系中揭示个体生活状况的经验内容，这就要求解释学本身进行科学的自我反思。哈贝马斯以此为思路寻找方法论重建的出路，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的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无疑成为了对这种出路寻找的最好回应。在哈贝马斯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方法论上是一种深层解释学（deep hermeneutics），从这种深层解释学中能够衍生出一种批判的解释学。

三、精神分析与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的建构

哈贝马斯将精神分析看成是一种深层解释学，不仅是因为精神分析的解释探查了普通解释学所没有研究的因果关系，而且在于精神分析解释的自我反思性（self-reflection）能够使解释学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最终指向一种批判的解释学。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将语言分析和因果分析结合起来，突破了一般解释学的局限，深化了解释学的发展。精神分析解释的重点不是文本表面的符号和语言，而是研究主体自身中产生错误的符号联系，因为精神分析所要把握的符号联系实际上是一种遭到肢解和歪曲的原文，要想充分的把握原文的思想，就必须透过并超越这些歪曲的表面语言符号去解释遭到肢解的思想本身。日常语言的语法要求符号、行为和表达之间的一致和互补，但是当这种一致性受到破坏和扭曲，符号、行为和表达之间产生混乱时，语言游戏也就失去创造和意义。由于这种混乱是由外部因素所导致的，所以主体自身觉察不到他在言行上的矛盾，并在语言的混乱和扭曲中表达和误解自己，而只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发觉自己对语法规则的背离、证明自己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谎言”（哈贝马斯，1999：219）。在哈贝马斯看来，言语中的这种混乱可以理解为“客观化表现”，正是这些客观化表现的存在导致了日常语言的非正常化，普通解释学只是基于语言分析，而不能将解释深入到造成语言混乱的客观的因果联系中，因此从根本上无法理解和解释这些语言的混乱表现。但是，精神分析的解释与普通解释学不同，它除了解释使主体产生错误认

识的原文中的显而易见的内容外，还要去了解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从而解释主体本身未了解得的、但却是他需要了解的潜在内容，弗洛伊德称其为“内心的外部世界”（弗洛伊德，1996：361）。

哈贝马斯认为，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作为精神分析的核心为解释被歪曲的思想联系提供了模式：梦是通过凝缩、移置、象征各种伪装手段以无法理解的、支离破碎和毫无逻辑的形式表达出来，即隐梦（梦的真实意义）变为显梦（梦的伪装表现）的过程，而释梦的工作就是将显梦回溯到隐梦的过程（张传开、章忠民，1987：84）。梦的解释技术只有在它不仅把握住遭到歪曲的原文，而且把握住对原文进行歪曲的思想本身时，才能实现对梦的真实含义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梦的第一层次是躯体内外的感知觉刺激，梦的中间层次可以归结为日间生活的残迹、梦的深层次是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作为梦的真正象征决定着隐梦的内容。梦的前两个层次的内容可以通过语言符号的解释而得到揭示，但是梦的深层次的符号内容却抗拒着解释工作。因此，只有觉察这种抗拒并找出这种抗拒的原因，才能打开梦的活动机制，消除抗拒、获得对梦的深层次的理解。弗洛伊德在对这种原因的探索中，揭示出对抗性和限制性的外部力量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乃是产生梦的根源。人的本能欲望由于受到外部力量的稽查，不能以正常的语法规则表达出来，于是便采取了没有语法规则、难以辨析的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因此，从梦的伪装形式中得到隐性表达的本能欲望之所以从根本上抗拒解释是因为外部力量对它的控制和压抑。在哈贝马斯看来，“歪曲和移置对语言解释来说只是一个意外的本性，而对精神分析而言却是一个系统的模式”（Nagele, 1987：69）。弗洛伊德用解释学的方法破译梦的原文所遇到的抗拒和梦的形成机制问题，使他能够把现在同过去的情境、原因和结果连在一起，从而开辟了将语言分析和因果分析结合在一起的深层解释学的道路。

其次，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分析的作为一种深层解释学是一种科学的自我反思并以自我反思完成着自己：

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要求从方法上进行自我反思的科学唯一可以理解的例子，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随着心理分析的产生，弗洛伊德揭示了由研究的逻辑本身开辟的、从方法论上通往被实证主义抛弃的哪个领域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1999：215）

哈贝马斯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科学的自我反思。精神分析之所以作为“深层解释学”就在于它的解释过程的与众不同，即它对因果关系的洞察。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候为直接目的，而和原因治疗的进行大致相似，也就是病人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去寻找病源之所在，消除内心的抗拒，学会阅读和解释被自己肢解和歪曲的原文，从而将无意识

从畸形表达方式转换为社会交往中的正常表达方式，最终揭示自己无意识的真实内容，使自身得以治愈。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就是一个解释过程：通过帮助和指导，主体运用自己的能力去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把受到肢解和歪曲的无意识的原文翻译成能够清晰理解的意识，从而使主体意识到自己的形成过程，重新占有缺失的生活史，恢复受到破坏的自我伦理的总体性，最终使分裂的自我得以同一，这个解释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的自我反思。因而，哈贝马斯指出：“心理分析的解釋学进行的理解活动是自我反思”（哈贝马斯，1999：229）。他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釋活动包含着两个维度的反思：一是主体通过回忆再现自己已经忘却的生活经历，探索和揭示自己不了解的无意识，从而重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这是主体对自己的生活史和无意识的批判性的认识过程，是主体的自我反思；一是主体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和角度来观察和审视自己，通过认识和洞悉自身抗拒无意识揭示的情绪，对由自己的病症产生的行为的派生行为进行觉察和辨别，从而消除抗拒，推动对无意识的认识。这种反思是对自我反思的抗拒进行的反思，是反思的前反思。因此，精神分析把无意识翻译成有意识是典型的自我反思，主体对自我无意识的解释和说明是以自我反思为基础，通过反思，主体才能认识到已完成的理解活动的无意识的先决条件，也只有通过反思，才能使理解活动获得使自身得到发展的力量。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作为从方法上进行自我反思的科学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精神分析通过把解释学深化为一种深层解释学揭示出科学的自我反思乃是“人的科学”的方法论，“反思的要素是批判的特征”（哈贝马斯，1999：41）。反思是意识的意识，是思想的思想，是批判的批判，它推动着认识的进步和真理的获得，以人的分析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必然包括这种认识批判的科学自我反思。

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分析自我反思的方法弥补了马克思方法论的不足。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反思，但“马克思是按照生产模式来理解反思的”（哈贝马斯，1999：39）。把反思规定在劳动这一工具性的层次上，这使他倾向于在工具活动的坐标系中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立人的科学，其“辩证法”的含义也由于其理论的实证性倾向而变得难以解释。

因此，马克思的方法论更多的是对政治经济做研究和批判，而往往将人的交往、文化和意识形态放逐于研究的视野之外。精神分析作为自我反思的深层解释学，以交往、文化、意识为客观领域，它能够将反思从政治经济领域拓展到意识形态领域，使“工具性”的反思变成“人的科学”的反思。

最后，哈贝马斯通过精神分析将解释学发展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建立起批判的解释学。普通解释学的基本方法是透过作者的外在行为、经验和语言表达达到同作者的内在精神相一致，从而实现理解和人际交往的互动。它的先验框架是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主体把这种语法规则内化到自我理解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就是把既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内化到心理结构之中，理解只能在传统的事实内活动。因此，普通解释学不可能使我们超越传统的和既定的一切限制而实现人的反思和

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分析的解释却突破了普通解释学的局限，在对精神病症的原因和行为动机的追查中，发现了既定的文化传统对人的控制和压抑：一定的社会制度只允许某些行为动机出现在社会交往中，而阻止另外一些动机和需求通过语言交往而成为明显的行为，个体为了从心理上清除这种不为社会制度所接受的需求，就需要把对这种需求的语言解释从社会交往中排除出去，即压抑为无意识的愿望。由于无意识的愿望不能获得解释和说明，个体同自己交往也就被阻挠、歪曲和破坏，导致了精神病症的发生。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会制度作为强大的外部力量替代了个体的这种内在强制，通过文化传统、公共语言的私人化将不为社会接受和满足的需求引到虚假满足的轨道上，于是病症“从语言的公共使用的逻辑同语义学的虚假的同一性中获得力量”（哈贝马斯，1999：259），歪曲的交往方式便内化到人性的结构之中，成为人的第二本能。这种虚假满足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个人无法认识，却无意识影响人的行为和理解的内在陌生领域——意识形态。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弗洛伊德在元心理学中获得了一种可以是人们理解制度的形成和幻想的意义，即理解统治与意识形态的被扭曲了的交往活动的框架”（哈贝马斯，1999：278）。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以虚假的同一性所缝制的合理性外衣掩盖着对人的真实欲望的压抑。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在社会制度统治中必然服务于有组织暴力的合法化，因此，语言不再是中立的，而具有了意识形态性，即“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着欺骗，而是语言本身便是欺骗”（Habermas, 1988：172）。

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病症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秘密在于，它的语言符号是公共的，但符号的意义和内容是私人的，这种隐秘的意义既无法为他人、也无法为病人自己觉察，因而无法实现自我认识而成了一道个体自我认识的屏障。在哈贝马斯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解释不仅探查到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特别是文化传统对人的侵害和奴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出了突破这种奴役的方法和道路——反思：社会成员通过自我的反思认识意识形态虚假合理性背后的无意识压抑，对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以此消解意识形态所设置的自我理解的屏障，从而认识自身的真正利益和要求，将扭曲的自我交往恢复到正常的自我交往，从而使个体获得解放。因而，哈贝马斯指出，哪里有意识形态，哪里就有批判解释学，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意识可以通过反思摆脱这些控制的力量，个体的自我反思乃是实现自身解放的唯一力量。这样，哈贝马斯通过精神分析解决了普通解释学的理解模式无法解决的意识形态问题，通过将解释学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批判，而确立起一种批判的解释学。

四、精神分析与哈贝马斯对方法论的重建

对哈贝马斯而言，精神分析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普通解释在方法论上的根本不同在于在自我反思的阶段上，精神分析的解释逻辑始终是面向现实的：

自然科学方法论，在它的自我反思阶段上能够揭示出语言同工具行为之间的特殊联系；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在它的自我反思阶段上能够揭示出语言与互动之间的特殊联系，并且把这种联系作为客观联系来认识和以这种理想的先验作用来规定这种联系。元心理学研究的依然是一种基础联系：即畸形语言和行为病理学之间的联系。这时，元心理学以一种日常语言为前提，这种语言理论的任务是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阐明符号的主体间性作用和语言的相互中介作用，以及使人们理解：对语言的语法的社会性适应，是个性化的过程。

（哈贝马斯，1999：254）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个体的病症即受压抑的状态不仅归之于分裂的语言符号，而且归之于歪曲的社会交往，是因为通过自我反思它清楚地看到语言符号的基础结构是社会在对外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强制过程中建立的，这种强制不仅是解释的对象，而且在语言的后面影响着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语法规则本身。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在自我反思的这个层面上，精神分析的解释将经验和先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连接在了一起，并超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使自身具有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但是，由于弗洛伊德对自身理论的唯科学主义的误解，使精神分析自我反思的品性窒息在实证科学的藩篱之中。自建立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弗洛伊德就坚定不移的把心理分析当作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他认为，精神活动和自然现象一样，可以做实证的分析 and 经验的归纳，因此，他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套用到精神分析自我反思的坐标系中，使精神分析具有了很强的实证性，从而阻塞了自我反思的道路。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分析“不是受操纵的自然过程，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在日常语言的主体通性层面上的一种自我反思活动”，（哈贝马斯，1999：250）是一门典型的人文科学。精神分析所表现出来的实证性并不是其本身固有的，而是弗洛伊德人为添加的，要还精神分析一个真实的原貌，就必须克服弗洛伊德对自身的误解，剥离其实证主义的外衣，使它成为一门崭新的人文科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方法论上恢复其科学的自我反思。

于是，哈贝马斯将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注入到解释学中，并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特别是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树立起一种批判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集反思与批判于一体，它不仅克服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使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摆脱了实证主义的阴影，而且提供了一种超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反思性批判方法论。因此，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对方法论的重建是围绕着解释学展开的，而精神分析的反思要素则是他建构解释学的中心，在《解释学要求普遍有效》一文中，他表明了这种意图：

哲学解释学不是规则指导下的实用技艺，而是一种批判；经过反思使得决定带给意识有关我们语言的体验，这些语言体验是我们在运用我们交往能力的过程中，也就是靠在语言中的运动获得的。正因为修辞学和解释学是指导和训练交往能力的，所以解释学的反思可以吸收这方面的经验。

（哈贝马斯，1986：19）

五、结论

因此，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对于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哈贝马斯通过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深层解释学，即作为把语言分析和因果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语言解释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自我反思的解释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来建构批判的解释学，从而最终找到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社会实践为趋向的反思性批判方法论，为其以后的理论特别是交往理论确立了方法论的基础。可见，哈贝马斯从精神分析深层解释学的自我反思中找到了重建方法论的出路。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马克思是他的入口，而弗洛伊德则成了他的出口，这便是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建构的方法论逻辑（曹卫东，2002：30）。

参考文献

- 曹卫东2002。《交往理性和诗学话语》。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弗洛伊德1996。《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哈贝马斯1986。〈解释学要求普遍有效〉，高地、鲁旭东译，《哲学译丛》，第3期：19-23。
- 1999。《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 伽达默尔1992。《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 陆炜1994。〈批判解释学何以可能——析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41-45。
- 欧力同1997。《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
- 张传开、章忠民198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述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狄尔泰2002。《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童奇志，王海欧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 HABERMAS, Jurgen 1988.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and Jerry A. Stark. Cambridge: MIT Press.
- NAGELE, Rainer 1987. *Reading After Freud*.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